

主编 高文檀

副主编 孙韶林 丁瑞忠



外国著名经济改革家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少龙 吴裕康

封面设计:杨 青

ISBN7—5407—1221—XG • 277 定价:13.20 元

外国著名经济改革家

(下)

主 编 高文檀

副主编 孙韶林 丁瑞忠

顾 问 李永采 王春良

(桂)新登字30号

外国著名经济改革家

高文檀 等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牟平正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 字数580,000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5407—1221—X/G·277

定价: 13.20元

傅立叶

闫光

沙立·傅立叶（1772—1837），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法国伟大的思想家。

1772年4月7日，傅立叶诞生在法国柏桑松城。他的父亲是一个富商，曾担任过商业法庭的庭长。母亲天主教徒。舅父有贵族称号。傅立叶早年丧父。中学毕业后，他继承其父的一部分遗产，去里昂学习经商，做为中间商人和经纪人，来往于巴黎、马赛、波尔多等名城。当时正值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因而傅立叶在此期间学习到不少的社会知识。他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伏尔泰及卢梭等人的名著，坚持天天阅读报刊，增长了洞察事物和分析问题的能力。雅各宾党人攻占里昂时，傅立叶几次被捕。在这期间，傅立叶曾离开里昂，独立经商，结果破产，后又应征入伍，到1796年退伍，重操旧业当店员。

傅立叶一生从事商业活动达30多年。长期的商业工作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能深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幕和劳动人民的疾苦。他看到法国大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并没有使劳动人民摆脱苦难，于是对旧的理论产生了怀疑。为了探索社会幸福之路，他立志创立新科学。

通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傅立叶终于在18世纪90年代末到19世纪初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主要有：《全世界和谐》（1803年）、《四种运动论》（1808年）、《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1822年）、《工业和协作的新世界，或发现依情欲分

2011/07

类的吸引人的劳动和适合天性的劳动的方法》(1829年)(简称《新世界》),以及由其弟子整理问世的《论商业》(1845年)等等。

傅立叶晚年完全摆脱了商业职务,致力进行创作。1831年,他对里昂工人起义深表同情,但他不主张暴力。1832年,他进行了一次“法朗吉”试验,很快失败了。傅立叶终生未婚,晚年生活孤独清苦,1837年10月10日,病逝于巴黎。

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产物。1789年,法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使法国的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这次革命用暴力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迎来了法国的工业革命,机器在一些部门得以采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正在逐渐形成。

资产阶级革命毕竟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穷与富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尖锐了:一方面是少数资产者集聚了大量财富,花天酒地;另一方面,广大的无产者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由于竞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开始出现。大批工人失业,社会上投机猖獗,物价飞涨,欺诈横行,卖淫泛滥。无产阶级刚从封建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又陷入资产阶级的魔掌之中,他们被迫奋起反抗。残酷的现实,对启蒙学者描绘的理性社会来说成为一幅令人失望的讽刺画。劳动群众的苦难和斗争,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先进思想家的同情。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变革社会的途径,设想新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也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傅立叶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有联系的,是统一的运动的,有规律的,是可知的。整个宇宙的运动有4种形式:社会运动、

动物运动、有机运动和物质（狭义）运动，人们可以通过对任何一种运动规律的认识，类推出其它3种运动规律来，4种运动的总和就构成了整个宇宙运动，其中社会运动是最主要的，了解社会运动规律是了解其它3种运动规律的钥匙。傅立叶认为，他是寻找和了解社会运动学说的第一个人，这种社会运动学说就是“情欲引力”的学说。

“情欲引力”被傅立叶说成是一种永恒的东西，是先于意识而存在的。为了发现上帝给人类社会所制定的规律，就要研究人的情欲。因为上帝的意图是通过人的情欲表现出来的。傅立叶把人类的情欲分为12种：5种感官的情欲，即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4种依恋情欲，即友谊、家庭、爱情、名利；3种分配情欲，即创造、竞赛、追求多样化。感官情欲的满足必须有物质财富为保证，精神情欲的满足又必须以感官情欲的满足为前提。物质生活满足了，精神情欲才能引发出来，当情欲引力占社会支配地位时，社会便是一个和谐协调的社会。所以人的情欲引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傅立叶按照自己的人类社会存在着规律性的思想，对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除了尚未有人类的“非真正时期”以外，他把人类社会的“上升序列”分为8个阶段：（一）原始时期。（二）蒙昧时期。这两个时期属于“生产活动以前各个时期”；（三）宗法制度。（四）野蛮制度。（五）文明制度。这3个阶段属于“分散的、欺诈的、令人厌恶的生产”，其中宗法制度是小规模生产，野蛮制度是中等生产，文明制度是大规模生产；（六）保障制度。（七）协作制度。（八）和谐制度。这3个阶段属于协作的、诚恳的、诱人的生产。其中保障制度是“半协作制度”，协作制度是“简单协作制度”，和谐制度是“复杂协作制度”。傅立叶在这里只是论述了他的社会运动过程32个时期的前8个时期，对其它的时期（下降的波动期）并未做具体说明。

他说，因为我们目前只能上升到第8时期，而这个时期和现存的4种制度比较起来，已是无限幸福的了。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压抑大多数人的情欲的，因此，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非常出色的揭露和批判。

傅立叶从自己的发展模式出发，认为文明制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制度代替野蛮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任何一种社会历史制度，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没有也不会有永恒的社会制度。傅立叶从各个角度剖析和批判了这个文明制度。预言了这个制度必将为更高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傅立叶认为，工业主义乃是一切罪恶的渊藪。在这种制度下，生产的分散和追求个人利益就造成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他风趣地说：“经济制度有一种更突出的破坏性特点，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两种利益的矛盾。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由于个人利益而与群众处于斗争状态，对群众不怀好意。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要求发生大火使城市的1/4化为灰烬；安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只用容易褪色的料子作衣服和用坏皮子作鞋子，以便多穿坏两套衣服和多穿坏两双鞋子——为了商业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合唱……。在文明制度的经济体系中，每一个人都这样处在蓄意与群众斗争的状态中，——这是违反协作制经营方式或颠倒世界的必然结果。”①

他认为，文明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为了几个富人，就必须有许多穷人。真正从事生产的人，只占1/3，2/3的人都过着寄生生

①《傅立叶选集》第三卷，第57—58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下同。

活。他指出凡是不从事生产的妇女、仆人、军人、官吏、商人、投机家、骗子、妓女、乞丐、法学家等都是寄生虫。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劳动者一贫如洗。资本主义工厂实际上就是“温和的监狱”和“贫困的温床”。只有在未来的社会中，这些非生产劳动就完全不需要了，贫困现象就可消失。

傅立叶还从生产的分散性，得出了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的结论。由于竞争，使生产过剩，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市场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状态。商人从中进行投机倒把。

傅立叶还把批判的重点放到商业上。他认为，商人应该是生产者的经理人和消费者的公仆，应为生产阶级服务。但在文明制度下，整个社会都受商业和商人的支配，社会的主要阶段要为次要阶级服务。傅立叶为此列举了资本主义商业的36种罪恶，称商人为骗子、强盗、恶棍、吸血鬼，他们什么也不生产却把收入的大部分占为己有。

在这个所谓的文明制度当中，劳动的雇佣性质和剥削性质使得工人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摧残和奴役。工业愈是发达，工人的状况越是恶化，他们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工人的失业，使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被剥夺，劳动者要想获得劳动权利是不可能的。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制度压迫妇女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沦为商品，婚姻与商品交易相类似。资产阶级的文明迫使妇女去卖淫，出卖爱情。在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败坏，两性关系混乱的现象相当普遍。妇女完全处于被压迫和无权的地位。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傅立叶认为，人类要最终摆脱苦难和折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创造大规模的生产、高度的科学和优美的艺术，因为这些动力是建立与贫苦和愚昧无知不相容的协作制度所必需的；第二，要发明这种与分散经营相反的协作结构，即经济的新

世界。”^①第一个条件已经做到，傅立叶把创造第二个条件做为自己的历史任务来完成，很明显，他的这种思想是以彻底改造现代社会为前提的。

傅立叶把他所设想的社会制度叫做“和谐制度”，用“和谐制度”代替文明制度，因为只有这种和谐社会才是自然所预定的社会制度。但从生产分散经营的文明制度不能一步就跨进复杂协作的和谐制度，而是要经过两个过渡时期：保障制度和协作制度。经过这两个过渡时期以后，才能进入和谐制度阶段。

按照傅立叶的计划，这种“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叫做“法郎吉”，“法郎吉”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消费协作社的组织，是一种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教育与劳动的结合，生产与消费的结合的集体经营的合作组织。每个“法郎吉”联合成理想的和谐社会。傅立叶的计划是，每个“法郎吉”占地1平方里，由1600人到2000人组成。理想的人数是1620人。因为傅立叶认为人的性格共有810种，在基层单位存在810种性格时，就能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它所喜爱的工作。再加810人就能使每种性格的人各有一个副职。全体成员都住在称为“法伦斯特尔”的公共大厦里。大厦中心是食堂、商店、图书馆、俱乐部、交易所、邮电局、礼堂、花房、教堂等。一侧是工厂、一侧是宿舍、旅馆和会议厅等。在“法郎吉”中，农业占了主导地位，工业只占第二位。

至于“法郎吉”的建立办法，傅立叶主张用抬股的办法筹集资金，用这些资金来购买土地、工具和必要的建筑物。入股者要把自己的资金作股交给“法郎吉”，并参加“法郎吉”的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资本家在“法郎吉”入股后，便

^①《傅立叶选集》第3卷，第27—28页。

享有充分权利和各种优待，并可以得到优厚的股息，股票可以继续和买卖。以此来吸引资本家到“法郎吉”中投资，幻想在保留私有制和利润、有阶级剥削的情况下建立全民的合作组织。

“法郎吉”里有各种专业队或联组。专业队和联组内又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以7至9人为宜。在“法郎吉”中，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参加或退出各个小组。一个人在这个小时可去牧马组放牧，另一个小时可以去种花，一天可以变换六、七个小组。这样劳动就成为一种享受，变成为满足人类最高情欲即创造欲的活动。这样，旧的分工就会被新的自由选择工种、经常调换工种和短时工作所代替。傅立叶并天才地预见在新社会里，竞赛将会代替竞争，劳动将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雇佣劳动将被精神的和物质的引力所激起的热情劳动所代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等都将消逝，只有不同的“法郎吉”。人们的体力和精神将得到最大的满足，进而使人们得到全面发展，劳动生产率也将获得极大提高。

在和谐制度下，人们不再象文明制度那样，为了挣得仅能糊口的工资而从事奴隶般的劳动，鼓励人们劳动热情的将是竞赛和精神力量，除此而外，工资和奖金在协作制度下，将具有新的作用。协作制度将把精神力量和劳动报酬的鼓励作用结合起来。傅立叶反对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他既不主张按需分配，但也不主张按劳分配，而是推出一个按比例分配的原则，即资本占 $4/12$ ，劳动占 $5/12$ ，才能占 $3/12$ 。这样，尽管还存在着穷人、富人及私有制，但他们能和平相处，不会出现矛盾纠纷，阶级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

“法郎吉”的商业是公有制经济。私人不得经营商业。“法郎吉”成员可以在商店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但成员之间不存在商品买卖关系。“法郎吉”相互之间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且商品流通量将比文明制度下高1百倍“法郎吉”有会计谢利

十，负责结算一切账目，并将每个人的预支收入数开信贷户头到年终结算和分配收入时，办理个人生活费和其它供应品的预支的结算。“法郎吉”之间的交易不用现金结算而是记帐，最后做出平衡表。

在“法郎吉”中，消费是按集体原则来组织的、每个“法郎吉”的成员的衣、食、住、行等费用，开始都由“法郎吉”垫付。“法郎吉”不承认家庭关系，而只承认个人。每个人都有一本帐。男子不能同时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办交涉。交涉都是每人分别进行的，只有3岁以下的儿童例外。

在“法郎吉”中，妇女与男子的地位完全平等。婚姻关系完全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人们在劳动之余都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家庭将被消灭，要由人数众多的家族取代一夫一妻的家庭。这时家族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将一致起来，人们将享受他们在目前状况下所无法得到的亲属关系的全部好处，特别是利害关系一致的好处。

傅立叶还特别关心文化教育事业。在“法郎吉”中，婴幼儿的生活费用全部由社会负担，有专门的保姆和护士照顾。妈妈必须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和艺术活动。“法郎吉”有专门适合儿童需要的小型的生产、小工厂、小工具、短时间的工作和舞蹈活动等等。儿童到7岁时就能从事30种不同的职业。青年人甚至将参加50种工作。科学和艺术都是生产性的。全体人民都要受到高等教育。学校精心发现和培养具有天才萌芽的学生。傅立叶为此曾预言和谐社会将出现更多的杰出的卓越的人物。人们的文化生活将是丰富多彩的。到处都有博物馆、科学研究机构、艺术机构和剧院等等。

傅立叶方案的空想性，明显地表现在他关于改造社会的途径的看法上。他说：“改造工作只要从1平方英里和1800人的小

范围的实验做起。”^①精心设计“法郎吉”是傅立叶多年的努力，按自己设计的蓝图进行试验也是他多年的愿望。

从1832年开始，傅立叶就对“法郎吉”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他募集了30多万法郎，在他信徒自愿拿出的一片土地上，组织“法郎吉”。按照他的计划，一个“法郎吉”至少需要120万法郎，因而不能建设豪华的“法伦斯泰尔”，只能建一个农场和一些简易建筑物，在征集“法郎吉”社员中，没有一个是傅立叶所希望的富人入股。参加这次试验的只有150人，而理想的人数是1682人。试验机构成立以后，傅立叶全面指导，但实验没有进行到多久，于1833年秋宣告失败。

傅立叶并未死心，他又来到巴黎，向上层贵族、达官要人呼吁宣传自己的“和谐制度”的优越性和正确性，并出告示，说任何资本家凡愿加入“法郎吉”试验的，都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他的住处来找他。傅立叶总是盼着资本家来找他共同进行第二次试验，但是，一直到傅立叶去世，始终没有一个他所希望的资本家来访过。“法郎吉”的试验最后以失败告终。

尽管这样，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还是有其闪烁光辉的一面的。他深入研究了人类的社会制度，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并预见了这个制度必然灭亡。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②他详尽地阐述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描画设计了未来社会的蓝图，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创造了理论基础。

但是，由于阶级时代的局限性，决定了傅立叶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也不可能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在他的情欲论当中，傅立叶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

①《傅立叶选集》第三卷，第1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59页。

他反对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他的“和谐制度”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法郎吉”中还存在私有制。他还把资本主义的罪恶，归因于生活资料的不足和分配办法的不合理等等。

莫 雷 诺

王春良

马丽亚诺·莫雷诺（1778—1811）阿根廷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社会经济改革家。

莫雷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土生白人，1778年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他在上秘鲁（今玻利维亚）的丘基萨卡（今苏克雷城）中心殖民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并且获得了神学和法律学学位。丘基萨卡中心殖民大学是当时南美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18世纪末19世纪初，南美洲各族人民解放斗争中的许多卓越领袖，都曾在这所大学学习过。除莫雷诺外，阿根廷独立运动中的另一些领导人，如贝·蒙特亚古多、胡安·何塞·卡斯特利、胡安·何塞·帕索等，也曾就读于该校。莫雷诺曾经有机会在一位学识渊博的神甫的私人图书馆里阅读到相当数量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正是在这些启蒙著作的思想影响下，他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拉普拉塔（阿根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提出了一系列见解精辟的论著。1802年，莫雷诺在考察印第安人苦难生活实况的基础上，撰写了著名的《印第安人私人徭役总论及亚纳康纳和米塔伊奥专论》的学位论文，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此后他在上秘鲁从事律师职业，1805年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开业当律师，并开始兼任公职。

西班牙殖民当局到1776年才正式成立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范围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图库曼、库约、班达奥连塔耳（乌拉圭）、巴拉圭和上秘鲁等省。但是，直到独立后的1823年，拉普拉

塔居民的总数才264.9万人。18世纪末，这里的经济主要是农牧业，西班牙的殖民枷锁，严重地束缚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179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畜牧业主在给西班牙国王的呼吁书中曾经申述，在这一年宰杀了60万头牛，其中当地消费15万头，其余45万头的肉都无法销售。呼吁书要求不仅出口肉类、皮革和畜产品，而且要求同时出口小麦、玉米、亚麻籽、布匹、贵重木材和葡萄酒等农林牧产品。但是，封建专制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只准殖民地与宗主国西班牙贸易，禁止与其他外国“自由贸易”。19世纪初，殖民地人民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间的矛盾已十分尖锐，正如阿根廷解放运动的领袖贝·蒙特亚古多当时所写：“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革命和法国向全世界发出的强大警报，唤起了西班牙殖民地的反抗精神。这两个国家号召人类进入伟大事变时代的热情，促进南美洲人开始考虑自己的命运。”^① 独立运动成为阿根廷不可逆转的潮流。

1809年8日，拉普拉塔总督辖区国库接近枯竭，新任总督西斯内罗斯一筹莫展，当时停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外的英国商船，利用这一时机，向总督主动提出，只要准许英国商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售，不仅可以交纳关税，而且可以帮助总督辖区摆脱财政危机。总督召开市议会和贸易署的代表进行协商。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西班牙专卖商为代表的一派坚决反对总督批准英国商人的请求，反对与宗主国西班牙以外的外国自由贸易。但是，以拉普拉塔土生白人地主、畜牧业主和商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赞成开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自由输入和输出货物，支持总督西斯内罗斯开放对英贸易港口。

在两派炽烈的争论中，拉普拉塔地主、畜牧业主和商人，委托

^①〔苏〕叶尔莫拉耶夫主编：《阿根廷史纲上册》，三联书店，第91页。

莫雷诺起草了一份著名的题为《畜牧业者备忘录》（或称《地主谏书》）的文件。莫雷诺在文件中指出，要摆脱拉普拉塔总督辖区财政的危机，必须开放同外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港口。而且，开放自由贸易的港口，不是一个解决财政问题的权宜措施，而是拉普拉塔发展经济首先是发展畜牧业的必要措施。莫雷诺起草的这个文件，反映了拉普拉塔土生白人地主，畜牧业主、商人的利益和要求。

1809年11月6日，总督迫于财政压力和拉普拉塔地主、畜牧业主、商人的积极要求，主持会议作出决议：在外国人守法的前提下，准许开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同外国人（主要是英国）进行通商贸易。这是继1778年10月12日西班牙通过的《西印度自由贸易条例及国税率法令》以来，对拉普拉塔贸易政策的重大突破。因为，1778年法令虽然提出了“自由贸易”，但它是指准许殖民地与宗主国在指定的港埠进行“自由贸易”，而同西班牙以外国家的贸易却继续被禁止。因此，1809年11月6日的决议，实际上是拉普拉塔真正摆脱西班牙专卖商垄断贸易的殖民桎梏的开始。正如莫雷诺《畜牧业者备忘录》文件所预言，实行上述措施的结果，到1809年底，总督辖区不但清偿了债务，而且国库还盈余了540万比索，出现了拉普拉塔经济史上空前未有的繁荣。它既最终结束了西班牙商人的垄断贸易和猖獗的走私买卖，又为拉普拉塔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里，莫雷诺起草的文件及其积极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1810年初，《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业邮报》编辑曼·贝耳格兰诺以文学会社的名人作掩护，建立了一个秘密的爱国者的政治俱乐部，这实际上是后来领导“五月革命”的最早组织。莫雷诺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卫戍部队的科·萨维德拉上校，也是这个秘密会社的成员。正是这个萨维德拉，后来与莫雷诺在政治经济改革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